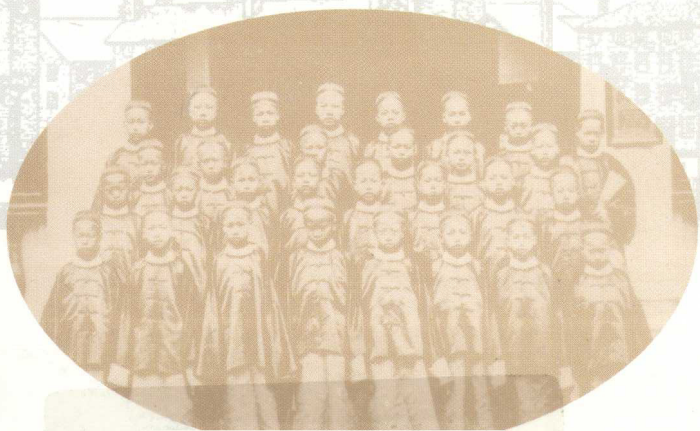


中国留美学生史

〔美〕史黛西·比勒著

张艳译 张猛校订



中国留美学生史

〔美〕史黛西·比勒著 张艳译 张猛校订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留美学生史/(美)比勒著;刘艳译. —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6
ISBN 978-7-108-03320-8

I. 中… II. ①比…②刘… III. 留学生教育—教育史—
中国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1276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图 字 01—2007—4775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201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 数 431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32.00元

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Copyright © 2004 by M. E. Sharpe, Inc. Translated by arrangement.

献给这一代中国留学生

序 言

罗志田

中国的近代，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群，就是留学生。这是一个仍在继续扩充、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又不时存在一些争议的群体。有些人对其特别欣赏，另一些人则稍带不满，还有更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恐怕尚未关注及此。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首先是规模大，其次是如潮水般波涛汹涌，至少有三四次所谓的高潮：甲午战争后蜂拥去日本是第一次，抗战后到美国的人数也不少，中共执掌政权后还有两次大规模的留学潮——五十年代（以下非特别注明，皆指二十世纪）留学苏联和东欧及“改革开放”后留学美国、日本和欧洲（后者迄今仍在延续，规模似也有增无减）。这又提示出第三个特点，即留学往往受到官方鼓励，其行为超越于政权的转换。要了解这不同的留学大潮，及此中形成的“留学生”群体，最好还是从其历史语境和发展进程中去认识。

从文化中心到称弟子国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雅俗皆知的“唐僧取经”故事那一段到天竺学佛，到外国去学习的实在不多，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并不充分。我们的历史记载和历史记忆中，倒是多少有些外来的学习者。唯对后者也不特别鼓励。中国传统行为准则的一个要点，即《礼记》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要别人先表示了“向学”的愿望且肯拜师，然后才鼓励教诲之。主动向人输出知识，即是“好为人师”，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提倡的。

这一准则也延伸到中外关系之上。以前国人自以为居天下之中，是谓中国。中国与周边甚至更远的“四裔”，共同构建着“天下”的完整。古人

一方面特别讲究“人我之别”，又总要怀柔“远人”。而中国之“中”和“远人”的“远”，都不一定是地理的，更多是文化的和心态的，以文野为区分（且文野也是可转变的）。故“远人”几乎就是“他人”的同义词，而“四裔”也往往等同于“四夷”。

由于万方来朝标志着天命所归，可以印证“中夏”的正当性，“四裔”的存在和向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正因其存在更多是象征性的，古人并不特别看重“四裔”，也不强调文化输出。怀柔“远人”的方式，主要是修文德以来之。对于倾慕华夏文化的“四夷”，中国固表欣赏且予鼓励，亦可向之传播中国学问。但“夷狄”若不遵行夏礼而沿用夷礼，通常亦听之任之，以存而不论的方式处之。对不那么友善的“夷狄”，更禁止向其输出中国文化。

随着西力东渐，近代中国人由被动而主动，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也曾设广方言馆以培训外语人才。与今天不同的是，当年一般人家并不视此为子弟的优先选择，盖以“谋生”之技艺为求学目的，那时尚未普及；而有志做国家栋梁者，原不必通“方言”。连学习外国的“方言”都不积极，遑论远赴外国念书了。十九世纪中叶第一批官派留美幼童，多半是边缘区域边缘人家的子弟。那一次官派留学生的尝试，也不以成功著称。

这个状况后来有了很大的转变。以文野分华夷的中国士人，本自视为世界文化中心，而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在一系列的战败之后，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观念；进而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几十年间，国人对西方的认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对西方的态度，也从降节学习“夷狄”之“长技”，到倾慕“泰西”的学问，蜂拥出洋游学，发生了急剧而彻底的转变。

屡受西方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向入侵者学习，特别是甲午战败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等于进一步从“师夷”走向了“师敌”。这一非常不合人之常情的现象，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特别值得探究。尽管当时就有人以“日人我之仇讎，不当使之借箸”为理由反对效法日本；更流行的观念，则是与其“远效西人，不若近

法日本”。^[1]

前往日本者占当时留学生的最大部分，而他们的主要目标并非学习日本，而是转手学习西方。康有为曾形象地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2]不过，任何仿效的过程自然包括意识层面的选择、更易和无意中的失真，仿效者本身在此进程中也会形成带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学说。转手“坐而食之”者，所学的究竟是牛还是农夫，亦正难说。

到日俄战争前后，“倭学”一词已出现在名满天下的湖南举人王闿运和几乎无人知晓的山西举人刘大鹏口中。这一多少有些不以为然的名词能够流通，提示着因转贩西学而获其地位的日本学，已经脱离了依附的地位，而渐具独立的认同。在另一些人眼中，“倭学”的地位更逐渐提高，成为与“泰西之学”并立的“泰东之学”。^[3]两者的并列表明，西方在中国的文化权势已扩展到日本身上。不论是贬还是尊，一个独立的日本学出现在中西对峙的格局中，都揭示出中国在近代文化竞争中更为惨重的失败——中介的独立存在意味着中学与西学之间的距离又更增大了。

大体上，近代中国学西方走的是一条上行下效、朝野配合（不全是有意）之路。不过，由于中国传统向不重视甚至阻止文化输出，中国士人对于文化竞争缺乏思想准备，基本是在中西竞争的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时人所谓“学战”的重要。虽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却为时已晚，不知不觉中，已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之路。

与此同时，西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也步步上升。1891年时，康有为已发现，当时士人“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4]戊戌维新前后，更出现极富想象力的“进种改良”或“合种通教”之说，即通过整

[1] 江苏松江知府濮子潼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三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13页。

[2] 康有为：《日本书日志·自序》，《康有为全集》，第3册，姜义华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85页（标点略有更易）。

[3] 说详罗志田：《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梁启超》，《南方周末》2002年11月28日C22版。

[4] 康有为：《答朱一新书》（1891年），《康子内外篇（外六种）》，中华书局，1988年，171页。

体的黄白通婚一次性地实现中西“合种”，真想从人种上“化为西人”。后来从梁启超到《国粹学报》之人，也至少都向往过中西“两大文明结婚”，觊觎着文化上的“合种通教”。^[1]到二十世纪初年，邓实回顾这段西力东侵的历程说：由于中国在近代中外竞争中屡屡失利，

忧时之士，愤神州之不振、哀黄民之多艰，以谓中国之弱，弱于中国之学；中国之学，必不足以强中国。于是而求西学。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方言之学堂、翻译之会社，如云而起。^[2]

邓实那段时间基本活动在上海，耳濡目染着中国最为尊西的风尚。类似的风气很快弥漫全国，且得到政府的鼓励。刘大鹏大约同时就观察到，当时“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于是“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他后来更总结说：朝廷从改设新学堂到废科举，进而“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学洋夷之学”，在西向路上步步深入。而“洋学既盛，孔孟之学遂无人讲，中国人士均尚西学”。^[3]

到二十世纪初年科举考试改革时，留学已渐成学子的众矢之的。严复在1902年观察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悻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4]几年后科举废除，留学风气更盛，如胡适在1910年给母亲的信中所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唯有出洋留学一途。”^[5]在那个时候，有特别家庭背景者或贫寒而急于谋生者，可能还有别的选项。对胡适这样希望做国家栋梁的小康子弟来说，留学可能真是上进

[1]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43—146页；《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20—21、74—76页。

[2] 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年第3号，第6张。

[3]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87—188页。

[4]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严复集》，第3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564页。

[5] 胡适致母，1910年6月30日，《安徽史学》，1989年1期，75页。

的“唯有”之一途。

类似心态到民国后已成普遍现象，胡适注意到，当时“国内学生，心目中唯以留学为最高目的”。因为那时能获得一个在外国可以“车载斗量”的本科学位，归国即被“尊之如帝天”。^[1]几年前邓实所见西人享受的社会尊崇，已渐过渡到留学生身上了。与几十年前良家子弟连方言学堂都不愿进的世风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

辛亥鼎革后，民国新政府也“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2]不少对革命有贡献的人，放弃政府的官职，而选择领取此赏，既印证了当年留学所受的青睐，也说明至少一部分人选择留学，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上进”（如领取此赏的川人任鸿隽，已官至总统府秘书，就仕途言绝不是个低起点）。

对昔人而言，上升性的社会变动不仅牵涉到个人出路，“振家声”乃是高层次的尽孝道，也是很多社会人不能不顾及的问题。然而，一个有志成为国家栋梁的读书人，当然不会仅仅考虑个人出路和家庭荣誉。曾努力争取并得到庚款留美机会的胡适和梅光迪，却都对留学异邦有着相当的保留。^[3]胡适更写出著名的《非留学篇》，慨叹“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竟然“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真是“天下之大耻”！^[4]

一声叹息之中，混杂着中国人长久的文化自负和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过渡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始终挣扎于中西新旧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心态，实难以言表。以留学生而非留学，其内心的紧张煎熬，又怎一个苦字了得！必认真体味他们那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方可以知人论世，进而了解充斥着各式各样诡论性（paradoxical）因素的近代中国。反过来，必对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发展演进的语境有“了解之同情”，才能真正懂得这些

[1]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早年文存》，周质平主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355、359—360页。

[2] 胡适是1910—1917年在美国读书，当时“留学界官费者居十之六七”（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早年文存》，355、370页）。除了和他一样的庚款生，还有清季各地方政府已开始派遣的官费生，以及民国因革命有功而领赏者。

[3] 参见罗志田：《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96—308页。

[4]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早年文存》，353—354页。

非留学的留学生。

教育救国的崎岖路

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学战观念在中国已渐普及。胡适之所以要“非”留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将中西之争视为两种文明之争，而留学是竞争失败即“学不能竞”的结果。文化竞争既然失败，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中国需要“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故留学虽为“吾国之大耻”，也不得不“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使中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混合之新文明”。^[1]

也因此，“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中国必须办好自己的大学，“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如果本国大学办不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这不但是“天下之大耻”，更重要的是，“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简言之，这是一条“教育救国”之路，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

在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的同时，前往欧美留学者虽数量相对较少，也同样呈现与日俱增之势。在世界历史上，这样大规模地往他国留学，似乎也是前所未有的。以中国文化那长久的自负，出现这样的现象，颇不合常理。据说只有文化竞争失败，才可能对征服者既憎恨又模仿，为了自救而忍受向敌人学习的屈辱。^[2]但近代中国领土主权基本保持，在某种程度上，能向敌人学习，恐怕也是信心尚存，即确信中学可以为体这一观念使然。

近代中国与各殖民地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领土主权基本保持。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和中国对侵略的态度，都与殖民地场域中的颇不相同。故近代中国与各殖民地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没有多少直接的可比性，却又多有相似或相反的参考之处；对殖民地的研究

[1] 本段与下段，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早年文存》，352—356页。

[2] Jean-Francois Revel, *Without Marx or Jesus* (Garden City, N. Y., 1971), p. 139.

取向（包括前些年兴起的“后殖民”取向），很多都不直接适用于中国，同时又有极大的参照性。必充分了解世界范围内侵略、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发展演变，才能真正看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特色”。

西人在殖民地历来少办教育，殖民地的高层次教育通常要诉诸留学。^[1]而近代中国与殖民地一大不同，即是教育的独立——先有适应科举考试的各级教育体制，后有自办的大中小学。科举未废时，留洋之人为数甚少，留学生也难成气候，不十分为社会所承认。废科举后，新制以文凭对应科举之功名，而中国的大学堂尚无毕业生，最高学历只能来自留学；洋文凭价值陡增，留学生之地位亦遽变。中国虽不是殖民地，无形中却形成了接近于殖民地的状况。但这个时段不长。随着中国自办教育的成长，主要人才越来越多出自本国学校，终与殖民地迥异。

与殖民地的留学生往往成为国内反帝运动的先驱不同，正因中国被侵略的程度相对浅，加上不重文化竞争的传统，中国人对异文化的排拒心理也相对较弱。从废科举到办理新学堂，都可见明显的外国影响。最早鼓吹废科举的，似乎就是西方传教士。中国自办的新教育，也基本走的是摹仿之路；清季主要摹仿日本式的西方教育体系，民国后美国影响渐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等学校中大量课程甚至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简言之，中国的新教育首先是自主的，同时又是摹仿的，且其摹仿也大体是自愿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留学和留学生都有其特别之处。清末民初西人和留学生先后被“尊之如帝天”的现象，反映出非常错综复杂的心态，无论在思想和社会层面，都一言难尽。中共执掌政权后的两次留学大潮，也与过去一样，都是官方主导和推动的（五十年代那次更完全是所谓政府行为）。一方面始终有自主的教育，同时又持续出现具有朝野共识的大规模留学，是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样看来，尽管胡适提出以中国办大学来取代留学这一长远规划仍带有“雪耻”的思绪（即不再为“弟子国”），“以建设为否定”的取向毕竟

[1] 如香港虽能在1949年后渐取代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东亚金融中心的地位，而教育却一直远逊于上海。回归之后，对比明显。近年亟思改变，呈突飞猛进之势，但基础不厚，积累不足，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已经提出，但要很多年之后，国人才逐渐认识到建设重于破坏的意义（实则迄今认识仍不足）。中国自身的教育和学术建设，始终未能达到足以作为再造文明的基础，恐怕是群体性的留学不仅不能废，也少见人“非”的一个主要原因。

若仅从教育视角看，中国本有学无常师的传统，即使较大规模的留学，也不必就是“国耻”。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也是美国海外留学的高峰，其中多数人是到德国读研究生。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里，美国人一面继续留学，同时开始重视自己的研究生教育，此后便基本确立了高等教育人才自我培养的局面（出国留学的美国人始终都有，但基本是一种个体行为）。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留学生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是远不如美国的。

平心而论，至少民国之后几次学制的策划、制定和修订，留学生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留学生在中国主要大学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如果不是战乱，中国大学教育还可以有更高的水准；即使在抗战期间，西南地区的一些核心大学（不仅是人们经常挂在口上的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似不输于世界上任何大学。在这方面，留学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国留学生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始终未能结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留学这一趋势，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当然还有很多政策和技术方面的因素，如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发展滞后，从一开始就分科过细也过重实用，等等）。

另一方面，当年中国留学生在政治、金融、法律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美国的留学生所能比拟的。这与各自的取向和定位有关：美国的留学从一开始就是以教育和学术为主的，而中国留学生则承担了远更宽广的责任。胡适当年所说的“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1]反映出很多人的共同心声。“医国”乃清末民初的通用语，其背后的预设是国已有病，这是很多具有保守倾向的人（从张之洞到钱穆）也愿意承认的；而药方不在本国既存资源之中，更是一个越来越得到广泛分享的观念。留学虽意味着走“教育救国”之路，“医国”毕竟是比较教育更宽广的任务，牵涉到方

[1]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早年文存》，353页。

面面的众多领域。

更由于“学生”本身就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新兴社群，一出现就受到不同寻常的对待，有意无意间也承担了很多“功夫在诗外”的责任。就像学生在“五四”后因地位上升而一度以运动为正业、以学习为副业一样，^[1]留学生从一开始就被赋予或寄予了各式各样超越于学业的重任。这一早期的思路不知不觉中成为有力的传统，要到二十世纪中叶，留学才向以科技为主的“学术”倾斜；但直到今天，从政府到媒体，也都把“回国创业”作为留学生的一个主要职能、出路甚或责任。

在这样的氛围下，近代中国的留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超越于学术和教育的特色，其成效和不足，也都不仅表现在教育和学术方面。康有为在民国初年慨叹：中国“游学之士，近已万数”，但在译书方面尚不及日本明治五年（1872，约清同治十一年）以前。盖留学生或者甫毕业即任显官，“或从党事，哗器取宠”，而无人肯从事于清冷之诵读。终至“游学数万，竟乏学者”。^[2]大约同时，胡适也观察到中国有留学生“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一专门学者”的现象。他以为这正是其定位所致，盖“国家之所求固不在此，而个人之所志亦不在此”。^[3]这样一种超越于教育和学术的定位，也导致了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者在国内的不同影响。

清末民初的东西洋留学生

留日学生张继在1903年说：“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以举国无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学生诸君。而东京之留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表率。”^[4]其以“学生诸君”对应“举国无人”，颇能体现当时社会变迁在思想层面的反映；而学生中又以“东京留学生”为表率，那种

[1] 参见罗志田：《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3期。

[2] 康有为：《共和议》（1917年），《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1043页。

[3]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早年文存》，364页。

[4] 自然生（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年），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685页。

自负和责任感，跃然纸上。

这并非仅是留日学生的自诩，辛亥鼎革后，留美学生梅光迪也表示“不能不崇拜东洋留学生”，因为他们办的杂志为革命成功奠定了舆论基础。^[1]胡适稍后采纳了这一见解，也说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其故非东洋学生之学问高于西洋学生也，乃东洋留学生之能著书立说者之功耳”。^[2]

直到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梁启超仍在发挥胡适这一见解，以为“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致使学西方的“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因此，西洋留学生是“深有负于国家”的。^[3]

的确，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中国思想文化学术中的日本痕迹非常显著。康有为所说的民初任高官和从事“党事”以造反的留学生，也都以留学日本者为主。但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后，中国教育发展模式不再以日本为学习榜样，日本教习在中国教育界的既存影响也急剧衰减。^[4]

大约同时，欧美留学生的大量归国意味着中国能直接阅读“蟹行文字”者突然增多，强化了直接以欧美为榜样的可行性。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多少象征着一种那时开始显露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影响的下降。此后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大潮，基本落实在“拿英美作榜样”（陈独秀语）及“以俄为师”两方面。

恰于此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五四学生运动后

[1] 梅光迪致胡适（1912年3月7日，原署正月十九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黄山书社，1994年，339页。

[2]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早年文存》，363页。

[3]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97—98页。

[4] 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4—86页。

的十年，思想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留英美学生的优势日显，逐渐取代过去留日学生的地位；而在高等教育领域，留美学生更渐成主流。越来越多的思想资源直接来自西方，不再转手于日本。到中国成了西方思想的战场后，留学生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增强。二十年代各大学不少新设的“国学”机构也以留学生为要员，用傅斯年的话说，“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1]连修本国史都不能不依赖留学生，最可见学术思想领域的权势转移。

大约从二十年代起，英美留学生逐渐取得一些思想学术的优势。于是有所谓“镀金”的英美留学生和“镀银”的日本留学生，两者在很多方面的待遇开始出现差异，且日渐明显。^[2]但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精英性明显的教育和学术领域，在面对大众的思想文化界，所谓“镀金派”不仅谈不上优势，甚至可以说处于劣势。至于在军事、金融、法律等方面，日本留学生仍保持着明显的优势，直到1949年的政权更迭。

就留学生本身而言，康有为所谓“游学数万，竟乏学者”的现象，在留日学生中也更普遍。当年学生去日本的方式本是蜂拥而入，其品质良莠不齐，许多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如1905年底因抗议日本歧视而返国的数千留日学生上海组织了中国公学，号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然而次年考入该校的胡适，此前不过念了两年上海的私立新学堂，在公学里竟然以英文好著名，算学也“毫不费力”。可知很多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在“新学”方面的知识水准，尚不如上海一些私立中学的学生。^[3]

虽然当年向国内介绍西洋思想的不必就是这些人，至少，凡留学生便以西学或新学见长的认知，从一开始就颇具迷思意味。另一方面，如果对留学生的社会定位本不一定以“学”为主，而当时更普遍的需求正是对政治或文化变革能发挥刺激作用的文字，则梁启超所谓“本末不具，派别不明”的输入方式，虽以浅薄著称，恰为社会所欢迎。反倒是那种更准确反

[1] 傅斯年致陈寅恪函，1929年9月9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

[2] 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64页。

[3]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45—46页。

映“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者，^[1]国人还未必就乐于接受；而输入者自身，也常常感到知音难觅的孤寂。

近代中国基本是个听众决定演员地位的时代。而动荡年代的听众，显然更喜欢所谓“梁启超式输入”的激情，却未必欣赏偏于学理的凝重。结果，西洋留学生对推广西学的参与，并未起到梁启超所想象的转变，他们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也未能弥合。相反，或许正因他们输入的新知过多考虑学说的“条理本末”，其努力往往成为自说自话，不仅不能像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人生出交涉”，就是与国内的知识精英，也存在着沟通的困难。

留美学者汤茂如在1926年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感受：“中国的学者有一种共同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所有。不识字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听他们的言论；即一般所谓知识阶级，亦不能完全明白领会。”其原因，就在“民众的知识程度太低”。结果，“学者自为学者，很难与社会交换意见”。^[2]

这样的区分，及其所标示的身份认同（若不计“没有资格”做听众的百姓，则一方是“一般知识阶级”，而汤氏等留学生乃为“中国学者”），实在意味深长。不“一般”的欧美留学生那种落寞孤寂的疏离感，最能体现当时中国社会对学理的接受程度，仍与清末“梁笔”风行之时相去不远。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的杨荫杭在报纸上代人立言说：

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3]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97—98页。

[2] 汤茂如：《平民教育运动之使命》，《晨报副刊》，1927年1月25日，10—11页。

[3] 杨荫杭：《何晏与王安石》，《申报》1921年11月1日，收入其《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458页。